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古巴统一革命组织
马坦萨斯省委会上的讲话



人 民 出 版 社

781

菲 德 尔 · 卡 斯 特 罗

在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馬坦薩斯省委会上的講話

(1962 年 4 月 11 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 · 北京

根据古巴《社会主义古巴》杂志
1962 年第 9 期譯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馬坦薩斯省委会上的講話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張 1，字數 21,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1·664 定价（四）0.15 元

《社会主义古巴》杂志編輯部按：在馬坦薩斯省委会討論統一革命組織的狀況、宗派主义和工作方法的會議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作了總結发言，闡述了一系列基本思想，在某些方面成为对他3月26日的讲话^①的补充和进一步說明。

下面是他作的總結发言的节录：

同志們：

我們正在討論的这个問題，對我們來說，是一个沉重的問題，如果某些事情在你們听來感到太突然，让你们吃驚的話。你們應該記住，在一連几天分析所有这些問題时，我們好些天的心情是压抑、痛苦和沉重的，是气愤和痛心的。这些問題全是沉重的問題，同志之間感到痛心的問題，我們同志們不得不討論这些問題，并在同志們中間相互进行批評，在彼此之間有着摯情、彼此极其敬重的同志們中間进行了批評，但是我們不得不在同志們当中提出这些事情，討論所有这些問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因为，很自然，为了得出結論，我們必須对所有这些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我們也經受了这当中的全部痛苦，我們面临一个痛苦的問題：必須在目前向如此热情地接受了革命思想、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民交待，必須让人民第一次看到如此严重的錯誤。人民对

① 指1962年3月26日所作的《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的电视讲话。——譯者注

社会主义革命、对馬克思主义革命、馬克思列宁主义抱着美好的想像，抱着深深的信心，热情地接受这一切事物，然而突然之間却不得不面对着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一个严重錯誤，革命的政治机构当中、統一革命組織当中的严重錯誤。

我們感到痛心的是不得不向人民提出这些問題。起初，我們甚至于考虑应如何进行討論，是否在各委员会中討論，是否让基层討論。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不可能不向全体人民提出这个問題，尽管所有这些事情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必須审查一位同志，是因为在这个領導机构的同志中間还有某些人情的因素需要考虑，像塞薩^①这样一位同志固然是一位好同志，然而他对那位将受审查的同志却免不了会有兄弟的手足之情。

我們得出結論：最好还是向人民說明这一切，首先因为这是我們避免不了的必要，因为如果不向人民說明，他們将会听到无穷的謠言，此外因为人民已受到这个問題的影响。你們对这个問題感到意外，在某种意义上說，我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們往往抱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傾向，把所有东西看成是玫瑰色的，因為我們有一种基本思想，认为我們的事业是正义的，认为我們的事业即使有种种錯誤，本身也是正确的；认为反对这个事业的人是可憎可恨的敌人，我們不容許我們維護的事业遭到攻击（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我們有各种錯誤，尽管我們会把事情做坏，但是归根到底有一条偉大的真理，这就是：我們在进行的事业，我們在維護的事业，是一件偉大的事业，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业，是我国人民的事业，是我們祖国的事业。此外我們还意識到，我們在对一个異常强大的敌人进行一場豪迈、壮丽的历史性搏斗。

① 指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的弟弟塞薩·埃斯卡兰特，他也是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導委员会委員。——譯者注

我們意識到我們的鬥爭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它所包含的道义价值。我們的革命是的确无愧于我国人民的一桩偉业。

我們往往有一种有点唯心主义味道的想法，认为既然我們維護的事业是正义的，既然我們代表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我們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不論我們怎么样做，也必然会向前发展，必然取得胜利。毫无疑問，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們这种唯心主义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要稍微想想过去的事情和所犯的錯誤，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由于我們的事业是正义和伟大的，尽管犯了各种錯誤，它仍然向前发展。

但是必須懂得，这有一个限度。我們犯了錯誤。确实我們不能說，所犯的这些錯誤是置革命于死地的錯誤。这些錯誤不是极端严重的，但是多少总算严重的，某些錯誤則是严重的。虽然錯誤不是极端严重的，但是非常多，这里可以运用辯证法的原理：量变可能引起质变，就是說，錯誤的数量上的增加可以对革命、对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引起质的变化。因此，現在我們必須拋棄这种傾向，即乐观地看待一切，而对次要的事情麻木大意，或者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看作次要的事情，而只关心我們自以为是主要的事情，只关心确实是主要的事情。这也正是我們会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的部分原因。

當我們決定开始對我們所做的工作进行一次批評，對我們的工作和革命的发展进行一次批評時，我們認為有充分的理由要这样做。但是当时我們还絲毫不了解这些事情积累了有多少。批評的必要比我們当时所想像的大得多。我們所犯的錯誤和所出的偏差要比我們在決定着手糾正时所設想的严重得多。我們多少感到意外，因為我們几乎是突然地了解到錯誤的严重性。显然，有一些因素起了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人民对革命領導人的信任在逐

步消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早先这里曾产生过一系列非常令人痛心的謠言，例如說卡米洛的失踪是由我們自己，由他本人的同志們一手造成的，这是革命的敌人散布的謠言，然而由于人民信任革命领导人，信任革命领导人的正直和品格，我們只不过反击一下，这些謠言馬上就烟消云散了。

可是，后来出現一种关于家长权利的謠言，这种謠言至少在哈瓦那流傳得很凶，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荒誕不經的話，竟认为剝夺家长的权利、把孩子集中起来、把他們送給俄国人管、把他們送进某个收容所这种无稽之談可能是真的……誰也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釋能把这些孩子送到什么地方去；然而尽管这个謠言是那样荒謬透頂，却没有产生怀疑，因为这里牽涉到的不是一个理智問題，而是母亲的感情問題，因为已經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惯，因为反革命往往事先就談論即将頒布的法律；然而頒布法律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們說将要实行城市改革，将要頒布这样的法律，将要頒布那样的法律……后来果然如是，人們已經有点习惯于某种事物：只要有某种傳說，后来都果然会成为现实。

由于过去发生过突然換发鈔票这样一件不得不突然地进行的罕有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对于上述的心理习惯來說，又是十分意外的，同时也由于这不是一个大道理的問題，而是一个感情問題，于是一些人竟相信了关于剝夺家长权利的謠言，以至于我們认为有必要加以反击，于是我們反击了，謠言也就消灭了。我們只不过向人民讲了一下道理，只不过向他們說了一声这是謊話，也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信任革命领导人；然而最近发生的謠言却是另一种性质的，已經影响人民对革命领导人的信任了；說什么菲德爾在某个大使館避難，又說什么菲德爾被囚禁了。尽管这种謠言

是那样荒謬透頂，居然有些人开始相信，我們当中的某些人确实在某个大使館避难。这一事实本身倒的确是对革命的危險，因为这就是在人們的腦子中塞进一些乱七八糟的不应有的想法；毫無疑問，從人們开始接受这类荒謬想法的一刻起，他們对革命領導人的信任就日漸消失。

这些問題促使人們有所警覺，促使我們更深入一些思考这些問題的原因，然而，在发生这些問題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些問題，开始同阿尼瓦耳同志产生某些磨擦，同时在这些日子里，阿尼瓦耳已經无所顧忌地、几乎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个人目的。剛才在座的一位同志正确地指出，阿尼瓦耳所运用的方法、所造成的种种习惯，实际上为正在进行的反对革命領導人的整个宣傳运动提供了根据。不光是菲德尔同志，而且还有許多其他同志，他們在人民中的威信在逐漸下降。而事实上，这整个宣傳运动都是有事实背景为根据的，因为阿尼瓦耳組織了一个儼然类似政府的机构。阿尼瓦耳是形式上的权力，而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他所搞的一切，都是多少靠了欺騙、奸詐和玩弄手段搞成的。很明显，他所苦心經營的一切不过是一座紙牌砌成的堡垒，然而事实上，阿尼瓦耳以自己个人代替了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領導委员会；他就是統一革命組織，他一个人代替了領導委员会的所有其他同志，代替了書記处，代替了領導委员会的所有其他同志。甚至代替了政府和各部长。

这是怎么搞的呢？难道阿尼瓦耳是个得天独厚的人，是个天份非凡的領袖，以致人人都来向他討教嗎？不是的。固然阿尼瓦耳是苦干的狂热的工作人員的典型，他的狂热却是野心家的狂热，因为到了阿尼瓦耳那样的年紀，还像他那样进行这样異常广泛的活动，那么不是出于公尔忘私的偉大热情就是出于狂妄无度的野心，二者必居其一。他之所以抱着个人目的而能得意一时，是因为在

某些根本問題上產生的普遍混亂，向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然而最主要的，是因為他利用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威信。

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被全國人民衷心而熱情地接受。只要回憶一下第二次全國人民大會的情況，誰都記得人民是如何善於明辨是非，人民對於提交這一在全世界都算盛況空前的巨大集會考慮的宣言的每一字每一句和其中包含的思想，是如何善於思考其價值，誰都會看到人民在政治上是多么敏銳，都會認識到我國人民有了多大的進步。我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原則，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領導作用的原則。黨實行領導，實際上人民也同意必需有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由這個黨來實行領導。所有人、全體人民都的確認爲統一革命組織起黨的領導作用。此外還相信我們是有集體領導的。阿尼瓦耳手段高明之處在於，他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叫人們以爲這就是傳達全國領導委員會的意見、下達黨的方針的地方。而實際上本來是應當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討論的。

他鼓吹這種想法（我下面還要談到他是怎樣在黨內鼓吹這種想法的），由於人民普遍尊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尊重黨作為領導機構的作用，他易如反掌地使得人人都相信，同統一革命組織商量、從統一革命組織取得指示是理所當然的事，是一種責任。既然人們已習慣於到這所樓房來听取指示，到這里來又是只到他的幾個辦公室去，到他的辦公室又是只找到他一個人，於是，埃斯卡蘭特搜羅到一批同他一起工作的下屬的同志。如果有誰沒像大伙一樣養成這種習慣，他會設法非常巧妙地提醒人家注意這一點，同時不致令這位同志起疑。他問道：你怎麼沒有同統一革命組織討論就做了這件事呢？統一革命組織就是他。他說：“你不能擅自做這件事，不能擅自做那件事”，那位同志就誠誠懇懇地接受了意見。

沒有問題，他是在執行一種壟斷和控制一切活動的政策，一種壟斷和控制黨的機構的政策。阿尼瓦耳同志在致力實現的是一種類似的政權；然而對此人們會問，這會有一天成為真正的政權嗎？回答是否定的。這有許多原因；首先是因為，不能想像，能把這樣的政策強加於我國這樣的人民，強加於我們大家這樣的革命者的隊伍，而不在一定的時刻產生危機；其次是因為，這條道路不會使阿尼瓦耳取得權力，也不會使任何人取得權力，而只會導致革命政權的毀滅。再者，這種類似的政權之所以永遠不能變為現實，是由於下面兩個原因：因為它早晚會發生危機，早晚會原形畢露；其次，因為即使不發生危機來收拾這種局面，也不會促使阿尼瓦耳取得政權，而是使反革命分子取得政權，造成像巴黎公社那樣的失敗，反革命取得勝利，而革命者則紛紛人頭落地。

自然，他是認真追求權力的。他建立了一個類似政府的機構，然而他心目中不以為他是製造一個類似的東西，而是實行一個對他關係重大的計劃。正是由於他當時在實行的這個計劃，由於他的野心所產生的政策，他從他所佔據的關鍵地位推行了在整個統一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我們不打算說，全部錯誤都絕對應由埃斯卡蘭特一個人負責。應該善於把阿尼瓦耳的責任同我們全體的責任以及這裡逍遙自在的無數阿尼瓦耳的責任區別開來。

然而，毫無疑問，他的活動，就我們所知，起了很大的影響，這表現為一系列真正惡劣的方法，一種確實對革命惡劣和有害的政策，因為他把這些方法和這種精神散布到我們正在建立的整個組織中，由於他散布這種風氣，起義青年組織竟也鬧到同統一革命組織中的情況一式一樣。在起義青年組織中是一切依樣畫葫蘆。在組織書記處中高踞着一位同志，他就是個雙料的阿尼瓦耳，唯一不同之點是：這個年青人身上沒有野心問題。他們看到阿尼瓦耳怎

样做，他們也就怎样做，起义青年联盟的組織書記处解决一切問題，絕對全部問題。

他还尽一切可能向其他群众团体散播这一政策和这种方法，給革命造成了实际的損害，因为这甚至对生产发生了不良影响，同志們。我們在生产上有問題，虽然并不是所有生产方面的問題都是由于类此的原因，但这个問題甚至也影响到我們目前的供应困难。

阿尼瓦耳从一开始就貫徹到整个統一工作中的政策和精神，遇到了有利的条件。誰給了阿尼瓦耳这个职务？可以說，阿尼瓦耳是自己任命自己担任这一职务的，或者說他是自己伸手去抓的，抓来的，确实是自封的，他要求一件工作，把这个职务抓到手，就千方百計把这个职务变为全部問題的中心。我們后来知道，这位同志过去有一系列的表现。我們痛心地发现，在他担任老党即社会党领导机构成員的整个时期，他有过許許多多专横粗暴的行为。

阿尼瓦耳的这种品质在种种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3月10日政变以前的一个阶段，問題不过是个个人修养差些，有时显得粗暴，某些方式方法过于生硬，对同志不够体貼。在政变以后的一段时期，他利用了政变带来的条件，即进行地下斗争、党处于非法地位、处于地下状态、集会困难、布拉斯同志又病倒了这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他可以任所欲为，靠阴谋詭計、欺騙、謊言以及一整套手段，实际上控制了正在进行的工作，已經甚至发现，他当时作了安排，使得某些同志如拉薩罗·培尼亚和奥尔多基不在国内，他实际上使拉薩罗·培尼亚在整个地下斗争的时期都远离古巴。現在，已經清楚，让这些同志远离国内，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現在，这一切是真相大白了：这样做是对他个人有利的，这样

做就造成一种条件，使他得以一手把握大权领导这个党的工作。然而，阿尼瓦耳的老同志们只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感觉到，阿尼瓦耳的待人接物，并不单纯是一个脾气和性格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方式方法问题；如果说在过去一个时期一切似乎都表明，这不过是方式方法上过于生硬、严厉、粗暴、不体贴，但用心还是好的，那么现在他们开始明白，阿尼瓦耳的处事和待人并不仅是存在着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居心不良的问题。

某些同志问道，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怎么早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首先必须考虑到一个组织在地下活动所处的条件，革命胜利所引起的条件的变化以及新的条件的出现，还应考虑到，他的态度也确实迷惑了人，人们长期以来都以为这只是方式方法和性格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野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实心实意的人、我们这些真正忠厚老实的人感到意外，那是并不奇怪的。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同志只有崇高的革命的理想，而毫无其他念头，那么自然很容易感到意外。连我们自己过去也绝对没有想到过，这一切外表现象下竟包藏着野心！这里应该说，他所干的事，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愚蠢的行为。我们怎么会想到，居然有人会这样愚蠢，居然有人会这样糊涂，竟至于在我们目前这样伟大的事业当中，在我们的革命这样包罗万象的巨大任务当中，一心一意为自己建立一个宝座，形成个人权力，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谁会想到这一点呢？谁能设想，在这次集会上，在座诸君之中有人会拔出左轮手枪对我们射击呢？在我们看来这是荒谬绝伦的，绝对不会有的人生出这样的念头。这一切正如同拔出手枪对准革命的心脏射击一样荒谬，没有人会这样预料的。

一切诚心诚意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上头来，尤其是当人人都忙于对敌斗争，当我们人人都忙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付入侵的

威胁、致力解决我們这一年所面临的种种問題的时候。因此，我們实际上几乎是把处理合并問題这样的重大任务委托給一个同志，信任他，信任他的才干，信任他的忠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那样的政策，而我們对这种政策却像是如梦初醒。我們在全国领导委员会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討論了錯誤，討論了一些同志在这个問題上所应負的責任。由于缺乏远見，沒有及时采取决定，或者不如說是由于粗心大意，由于有点疏忽，有点疑虑，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犹豫不决，这个問題沒有能及时提出来，沒有能更早提出来。誰也不能猜测这个問題應該早一些还是晚一些发现，因为这甚至在問題已經到了暴露的地步之时还是很难办到的。資本主义的罪恶，也是在資本主义已經发展起来时才暴露出来的。許多疾病的发现，是在病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因此，这一弊病沒有能及早加以反掉，沒有能在我們发现这一弊病以前加以反掉，乃是完全可能的事。

只有少数人能看到問題往往是不够的，实际上不是往往不够，而是在任何問題上只有少数人看到問題都是不够的。有些人看得比較远，比較深。但是，为了克服一种弊病，必須許多人都意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实际上，已有許多人意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你們已經意識到这种弊病的为害。表現在哪里呢？表現就是：你們不同意所发生的一系列办糟了的事情，虽然沒有人能清楚地說明这些办糟了的事情的根源何在。唯有当各省都发生許多事情，让同志們可以举出一連串事实，并表明已經有了充分的判断的根据使得有可能开始克服一种政策引起的弊病的时候，才能反掉这种弊病。

而且，这些弊病也不可能在別的时候克服，只有在今天，当革命已經有了明确的道路，有了絕對明确地規定在馬克思主义营垒

內的意識形態，這些弊病才有可能被消除。正是靠了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原則，靠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才能夠着手克服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中產生的缺點，因為當不存在這種條件時，當鬥爭是在思想領域內進行時，當對保守或反動流派進行鬥爭的時候，當整個鬥爭的鋒芒必須針對帝國主義思想時，的確很難開始考慮並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而且不到實際上問題本身已發展到有目共睹的時候，也是不可能着手考慮並加以解決的。

確實，人民看出這些問題比組織本身還要早，群眾的嗅覺比革命黨員還要靈，早在一些時候以前，我們的人民群眾就開始看出一系列的不正常現象、不正規狀態和不正確的事情，而我們革命黨員自己對此還沒有看出來，這就再一次說明了，我們是生活在象牙之塔之中，實際上同群眾失去了接觸。

這個問題被稱為宗派主義問題，然而宗派主義一詞還不夠廣泛，還不足以概括我們正在糾正的所有問題的性質，因為可以有一種狂熱的宗派主義，一種誠實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是從好心出發，堅決而執拗地認為，凡是思想和自己不同的人，凡是不參加某一個集團的人都不是好人。這種宗派主義是不好的，它本身就造成損害，然而現在不僅止是一個宗派主義的問題。

宗派主義成了一種工具，一種政策的工具；一整套政策的工具；然而這種政策的內容並不止於宗派主義。宗派主義不過是一種工具，實際上這是一個脫離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問題，是一個特權的問題，是一方面偏激另一方面放任的問題，是等級觀念，甚至於出現腐化墮落、講親戚關係、朋友情面、徇私苟且、機會主義的萌芽的問題，是形成這整個情況的一系列事情，是正在發展的一整套政策的問題。

宗派主義不過是一個工具。宗派主義沒有遭到打擊，本來是

应当对它进行斗争的。一种健康的政策原应是从一开始就对宗派主义进行斗争，正如同过去对其他宗派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一样，因为宗派主义本身，姑勿论构成这个问题的其他因素，就已经糟糕了。然而，光是宗派主义当然还不算那么糟糕。宗派主义成为一种政策的工具，那才不止是糟糕，而是严重，十分严重。宗派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激烈思想。有一种大错特错的想法，以为宗派主义是一种什么激烈的东西。宗派主义甚至于可能是一种反动的宗派主义，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妨碍革命思想，使革命发展开倒车。宗派主义虽然在革命的环境中有其产生的原因，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一种激烈情绪，革命情绪，甚至不能说它总是一种过激的立场。宗派主义的产物是严重脱离群众，使革命的政治机构遭到削弱，使革命遭到削弱，使革命患了贫血症，丧失朝气，失去力量。

为什么呢？因为宗派主义使任何革命政党脱离群众，而对任何革命先锋队部队来说，抚育它的是群众，扶养它的是群众，对任何革命组织来说，给它输送血液、赋予它力量的是群众，脱离群众、与群众失去联系，就等于割断了革命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脐带，割断了革命组织吸取养料、吸取血液、朝气、力量，取得干部的途径，因为力量和朝气全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因为一个革命机构的存在，不是为了革命机构本身；一个革命机构的存在是为了革命的群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革命是由群众来进行并且为了群众而进行的，进行革命要有一个为群众着想的群众的党。这是一个党存在的理由，它的全部声望和权威决定于它同群众的实际联系。这个党并不因它是一个党就在群众中有权威，而是因为它在群众中有权威和声望，才成其为一个党。假如它同群众没有联系，在群众中没有声望、没有权威，它就不算一个党；它就变成了一个患了残疾的可怜的组织，越来越不成其为政党了，因为它的生存的依据就在

于它同群众的联系。

宗派主义势必产生特权，一方面是纵容，另一方面是不信任。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凡是沒有一定的条件、沒有一定的經歷的人，具体地說，沒有老黨員的資历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都被认为未經受过考驗的人。但是，如果在地下活动时期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宗派主义是不好的話（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如果一个革命組織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同群众沒有联系，就决不能取得政权），如果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宗派主义是不好的話，那么在执政时就更不好，更有害，更荒謬，更不可想像；尤其不可想像的是，这发生在几百万男女采取了一种革命的立場，一种革命的态度并且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时候，而他們的接受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灌輸，而是因为他們在自己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中，在天天不断地同反动派、同帝国主义、同敌人斗争当中，在三年中所学到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說，是平时三四十年也学不到的。

革命的一年，列宁不是說一年，列宁說六个月，从1917年的资产階級革命到无产階級革命的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俄国的群众所学到的东西超过以前三十年中所学到的东西，而我国的群众則是面对帝国主义，随着斗争的鍛炼，随着广大劳动群众的階級意識的觉醒，学到了許多东西，发展壮大，热心地、真誠地皈依了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无需证明的。

在这种情况下，抱有宗派主义更是加倍荒謬无理。本来應該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但沒有进行斗争；过去曾同別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斗争，这种斗争取得了輝煌的成果。試想，一个五十万居民的省份，却只有二百七十七名黨員，你們自己也能明白抱有宗派主义是多么严重了。你們以为支持革命的人，我是指农民、工人和劳动者阶层，就只是二百七十七人了吗？宗派主义把一省的全部工作全依

靠这二百十七人，它引导到多么荒謬的道路上去啊！

这里說二百十七人，但是我肯定，在这二百十七人中，至少有一百人被从这个省調往别的省去了，去担任别的工作了，去做别的事情了，在这个省中大概只留下八、九十人了。制造这种虛荣心，制造这种等級風气，制造这种“我是多少年多少年的黨員”的問題，制造这种虛荣的事情是令人气憤的。因为这种人的数目越小，他們就越是使得数以万計乃至数十万計的不像他們的人处于不利的情況，光是宣揚这些已在群众中产生激怒和气憤，何况在此同时还有在各战綫上执行一种宗派主义政策的现实情况，这种政策使人人沒了指望，如果他不屬於那些能說“我們是多少年多少年黨員”的人的集团，他就不能当行政领导人，不能当工会领导人，不能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不能担任一个报酬很高的工作，不能取得一个荣誉的地位，不能得到助学金，不能出去旅行等等；何况实际上这已不是一种說法，一种宣揚，而是同发生的事实有联系了，其結果是由于不断抽掉所有老的革命人員而削弱了工作单位，例如公共汽車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单单在一天內，从这个单位抽掉了四百名老党员，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单位实际上一个老党员也沒有了；另外，在隨便哪一家工厂中，人們可以看到，人民和群众可以看到，假如那里有十二名老党员，那么就有六人被調走，一人去G2工作，一人去做外交信使工作，一人去做外事工作，一人去管理一件事情，一人出国訪問，还留下六人，在留下的六人中，他們派一人当行政领导人，一人当人事处长，一人当車間主任，一人当其他工作的負責人，于是一个也不剩了。

当后来要成立革命支部时，又采用了宗派主义的方法，行政领导人、人事处长、車間主任、这些同志們各自的女秘书和一些亲密朋友都当了支部成員。群众通通免进！我們了解到，我們采用的